

主编:管益忻
常务副主编:启文
副主编:白卫星
学术支持:
齐桓仲父大战略研究院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学术顾问: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全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国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葛志荣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李新泰 刘诗白 刘 伟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国有 张曙光 张晓仙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第 266 期 (总第 372 期) 2018 年 9 月 3 日 星期一 投稿邮箱:jixzb@163.com 本刊订阅方法: 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 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编者按

最近, 我们听到了越来越多来自企业家“呼吁减税”的声音。为何年年减税降费, 企业却仍感觉税负重, 在由凤凰网财经和南开金融学院主办的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 五位来自金融领域的专家和首席经济学家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杨伟民: 企业没有活力, 谈什么宏观政策都没有意义

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语重心长地说: “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可以是多收钱多支出, 也可以少收钱, 把钱留给企业、居民、市场主体, 让他们决定该怎么样花。决定 13 亿人和 1 亿市场主体的钱该怎么样花, 搞得清楚吗? 这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的要求。”

杨伟民直言: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稳定宏观税负, 但凭直观的感觉来看, 财政收入占比和中央财政占比在大幅度提高, 而且提高的速度很快。”

减税是必须的, 减税、降费, 最后消灭费, 这是长远的方向。我们要从长远的国家竞争力的角度来考虑发展的问题。

企业减税的现实意义

从宏观来看, 改革开放初期占 GDP 的比重大部分提高, 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 中央财政有段时间很难过, 因此当时出台了税改和财税改革的方针: 提高两个比重。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 但这两个比重一直没有改。”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宏观税负还是在增加, 我觉得应该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 因为是一个基本目标、原则。无论是改任何一个税, 到底是降低、提高, 还是稳定了宏观税负, 应该从这样的大目标来看: 为什么这样做?”

中国经济从过去的主要依靠投资、出口转向主要依靠消费来拉动, 是这样大的方针, 现在改革还没有到位。

“财政制度存有问题, 降成本不是企业内部的成本怎么样降, 而是全社会宏观的成本怎么样降。”杨伟民指出, 其实地方债务问题的根源在于财税制度不合理。“财权和事权不匹配, 地方政府承担很多事, 但是没有财权, 财政部给你财力, 后面发下去, 造成很大的浪费。然后工业去补贴, 增加支出, 不愿意去减税。减税更多是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因为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增加三大主题的活力, 国企、民企、外企。”

杨伟民呼吁, 减税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最核心、最关键、最重要的是要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的税率。

“金融业收入那么高, 金融业占 GDP 的比例, 金融业的利润也很高, 上市公司中几个银行的利润超过其他实体经济企业的利润, 但金融业税率是 6%, 这不合理。那么高的利润, 那么低的税率。高技术企业却要交 15% 所得税, 制造业 16%, 是否合理? 等于是压制造

业, 鼓励金融业。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愿意把钱投入到金融业, 税少, 利润高。”

徐林: 中国企业税收的痛苦感比较高, 应该为企业进一步减税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在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 中国减税的空间是有的, 特别是给企业减税。我们看一个国家企业的税负是看它和别的国家之间在进行比较之后, 是否具有竞争力。

拿中国的税收制度和美国比, 中国的企业除了要交所得税还要交增值税, 所得税和增值税不一样, 企业盈利就交, 亏损了没有所得税就不用交, 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增值税是流转税, 只要企业开张运营就要交, 亏损了也要交。

我们与美国相比要多交一个税, 同时企业的所得税比美国现在要高。特朗普减税后, 美国企业税降到 21%, 我们是 25%。再加上增值税, 虽然可以抵扣一部分, 但不是所有的可以抵扣。这样弄下来之后, 中国企业税收的痛苦感比较高, 我不单纯的主张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要扩大政府支出, 但是应该为企业进一步减税。营改增的方案里面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因为不是所有的服务行业的企业都通过营改增减少了税收, 有的还增加了税收。比如抵扣比较少的服务业企业, 税收反而增加。

张岸元: 税收体制改革难度大

东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在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 美国减税减的是所得税, 如果减了所得税之后, 马上反映企业的变化, 更容易在金融市场得到直接的反映。中国也在减税, 但是减的是增值税, 环环抵扣, 因此这两个税制上的差异导致不同。

按照三档变两档推进, 原来是 17%、11% 和 6%, 意味着中间的 11% 要被下拉。但是后来这个方案显然太困难, 做这么大的增值税改革有很大的困难, 把 17% 拉到 16%, 11% 拉到 10%, 是过渡方案, 中国的财政要过日子。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难度比较大, 有可能年度就到此为止。

中国个人税收的税率最高是 45%, 但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是综合征收个税的事情, 我估计三五年很难落实, 太复杂了。我自己跑一些企业, 与加强税收征管相比, 减税有限, 这也是导致今年不管个税还是各种税收大幅上升的原因。

范小云: 中国当前有效的减税空间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小云在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 减税的目标必要性没有问题, 但是有效的减税空间可能还值得怀疑。

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 我个人觉得应该有更大力度的减税来支持有效需求的持续增长。还有一个紧迫原因是, 进入 2018 年之后, 企业的债务不断地爆发出来, 反映出了重要的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 即我们的企业的成本、负担很重。因此我们看到在现在强监管、金融去杠杆、金融紧缩等等的环境下, 企业的债务毁约也不断地爆发, 减税的事情更加的迫切。

缴文超: 民营企业可持续性的问题一直被忽视

万联证券研究所所长缴文超在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 其实很多问题过去都是忽视了整个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可持续

性的问题, 包括教育在整个资本运作的过程。

A 股当中究竟能出几个企业家? 很多没有, 很多来 A 股是希望通过资本运作的形式来赚一笔钱, 很少看到 A 股的企业家真正的经营企业, 从百年企业经营下去。从长期的趋势来看, 股市的好转要到 2019 年以后才看到。

我之前给营业部讲课的时候, 很多营业部没有钱, 反映到现在的日均成交量, 今年 6 月份出来之后, 全行业的增长都是负增长, 即大家流传的所有证券公司在裁员降薪。为什么出现这种问题? 今年的股市其实消灭了很多上市公司的的大股东, 至少从目前来看, 我认为 A 股当中绝大部分账户目前处于消沉或者僵尸的状态。

竺劲: 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直接税体系到间接税体系的变革

东方证券房地产及中小市值团队负责人、房地产行业首席分析师竺劲在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 现在税改的目标, 可能还是以降低企业的负担为主要的方向, 这可能是来提高整体的经济活力, 比较大的一个方向。

第二个, 从我的层面看, 现在中国从时间点上很像美国 1910 年左右的时间, 当时美国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从间接税体系向直接税体系转变。

未来整个经济生活和经济的发展都会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可能未来高收入人群的税负会有所提高, 收入较低的阶层税负有所下降; 整体上对于经济来说, 的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消费需求进一步的增长。未来税改对供给侧改革、加大消费来说有比较关键的作用。 (宗承)

别让房地产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

■ 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九霖

土耳其原本属于最接近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 委内瑞拉原本是靠石油发展起来的强盛的国度。那么, 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地从天堂走下地狱的呢? 这两个国家过山车一样的经济发展历程, 能给我们中国哪些借鉴呢?

最近, 南美国家委内瑞拉和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土耳其发生的危机, 颇为引人关注, 人们都在担心他们的危机会不会像当年的欧债危机那样蔓延至全球。

委内瑞拉恶性通胀, 货币贬值, 一杯咖啡的价格居然从 2300 玻利瓦尔币涨到了 200 万玻利瓦尔币; 其物资匮乏的程度, 连药店、超市的货架上都是空荡荡的, 以至中产阶级都饿倒在垃圾堆里捡吃的; 社会治安恶化, 暴力犯罪猖獗, 发给孩子的免费午餐也遭到哄抢, 警察白天当差晚上成了劫匪。自 2014 年经济危机以来, 委内瑞拉的“极端贫困”人口已经增加了 53%。有人形容说, 委内瑞拉是 20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最大规模的崩溃。

在土耳其, 虽然总统埃尔多安上台后, 一直维持 6%—10% 的高速经济增长, 但土耳其不是依靠创新与内需而发展的, 而是高度地依赖外国资本。截至 2017 年底, 土耳其企业部门的外汇债务已经攀升至 3280 亿美元的高位。经常账户的赤字 500 亿美元, 而土耳其央行持有净国际储备仅 450 亿美元。土耳其债务与 GDP 的比值高达 70%。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土耳其原本属于最接近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 委内瑞拉原本是靠石油发展起来的强盛的国度。那么, 它们是如何一步一步地从天堂走下地狱的呢? 这两个国家过山车一样的经济发展历程, 能给我们中国哪些借鉴呢?

尽管委内瑞拉和土耳其的危机分别存在各自的原因, 引发危机的导火线也不同, 但从总结教训以便获得启示的角度出发, 它们的确存在很多共同之处。除了这两个国家在政治上的强人统治和乌托邦式的理念之外, 它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高通脹、高债务和缺乏支柱性产业, 即整个国家都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

行强人政治, 另一方面实施不切实际的高福利制度。但查韦斯幸运, 在其统治时期, 高油价为委内瑞拉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但随着后来油价的暴跌, 政府收入锐减。为弥补财政赤字, 委内瑞拉央行不得不开动印钞机, 滥发发行货币的结果, 自然造成了通胀的飙升。

而货币的急剧贬值, 造成了民众收入的大幅下降, 失业率也不断抬升, 大量资本加速外逃, 委内瑞拉本来就不多的外汇储备很快接近耗干, 这又形成恶性循环, 进一步地加剧了货币的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到今年年底, 委内瑞拉的通胀率将高达 1000000%, 逼近人类通胀史上的最高水平。过去四年, 委内瑞拉的 GDP 大跌了 35%, 比美国大萧条时期还要恐怖。

委内瑞拉的支柱产业是石油, 它拥有全球最大的原油储量, 比沙特还要多, 差不多相当于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储量之和, 是俄罗斯的三倍。委内瑞拉长期寄生于石油, 没有发展起自己的民族工业。委内瑞拉超过 2/3 的商品都依靠进口, 成了南美少数的几个连农产品都要进口的国家。

石油价格的下跌和美国的制裁, 成了压死委内瑞拉的最后一根稻草。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中东之王”, 被该国反对派称为“土耳其第一狂人。”其政治野心是恢复昔日奥斯曼帝国的辉煌与荣光。

在过去的 11 年里, 埃尔多安采取了一系列的激进措施, 促使土耳其的 GDP 年大幅增长, 最高时达到 11.11%, 一度超过中国的增长速度。除了 2009 年因为经济危机出现下滑之外, 埃尔多安统治期间的大多数年份里, 土耳其的增长都维持在 6% 以上, 跑赢了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2017 年, 土耳其的人均 GDP 为 10512 美元, 位居全球第 63 位, 比中国的 71 位的 8643 美元高出不少, 也高过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巴西。

但是, 土耳其的增长方式非常简单、极为粗暴, 那就是: 通过印钱, 刺激增长。从 2003 年至今, 土耳其的 M2 增加了 24 倍。

与此同时, 土耳其外债高筑。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土耳其 2017 年的 GDP 仅为 8495 亿美元, 其外债约占 GDP 的 55%。2018 年第一季度, 外债总额达到 4667 亿美元。而土耳其的外汇储备却只有 1350 亿美元, 连偿付外债和经常账户赤字的一半都不够。

今年 7 月, 土耳其的通胀率达到了 12 年的新高, 达到了 15.85%。高通脹也增加了土耳其的借钱难度。到 2017 年底, 土耳其银行利率一路飙到了 17.75%。

土耳其的旅游、银行、建筑业较发达; 但工业较落后, 产业部门不全, 生产工艺及其技术水平较低, 唯制农业较发达; 农业以麦子、棉花、橄榄、烟叶、茶叶、豆类植物生产为主, 机械化水平不高。

房地产早已成为土耳其的支柱产业。2018 年第一季度, 建筑业的增长率为 6.9%, 非常接近 7.4% 的 GDP 增长率。土耳其的房地产价格指数, 一再迎来大爆发。它从 2008 年不到 2000 亿的总量, 一直涨到了如今的 1.2 万亿, 10 年间上涨了 6 倍还多。可是,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 土耳其的房价平均已经下降 30%。今年以来, 房价已经降了近 60%。

由于除房地产之外, 土耳其没有其他核心产业, 美国稍一制裁就让其风雨飘摇。与委内瑞拉和土耳其比较起来, 中国具有不少相似之处, 又有很多不同之处。

相似之处主要在于超发货币。从 1996 年到 2016 年 2 月底, 我国 M2 的总量是 1995 年年底的 23.5 倍, 年复合增长率为 16.8%。而同期美国的 M2 总量却是 1995 年年底的 3.4 倍, 年复合增长率为 6.35%。最近两年, 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 我国的 M2 增速有所放缓, 但仍然明显高于我国 GDP 的增速和美国 M2 的增速。有人据此计算后, 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应该是 60:1。但因为股市和楼市积压了大量的资金, 达到这个程度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我国与委内瑞拉和土耳其不同的地方很多, 也十分明显。最主要的体现在, 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洗礼, 中国已经建立了种类庞大而齐全的工业体系。尽管中国的印钞也带来了通货膨胀、房价飙升等问题, 但是印钞后的投资也给工业体系带来了新的活力, 让其变得成熟和高效, 而工业体系所带来的生产升级又促使中国的经济进一步稳固, 为社会所带来的财富总量也不断增加, 这样, 又将货币超发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做了消减。

为了吸取委内瑞拉和土耳其的教训, 我国在挤掉地产和金融泡沫, 优化债务结构, 控制货币超发的同时, 要在 3 个方面苦下功夫、做好功课——这也是我们应对中美贸易战的良方: 发展高科技产业、高端制造业、高度发达的金融业。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在我国早已形成了共识。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所做出的研究表明: 在美国战后农业生产的增长中, 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仅为 20%, 其余的 80% 是由科学技术引起的。但是, 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还存在起步晚、投入

不足、发展不平衡、核心技术缺乏和对 GDP 的贡献不足等问题。

在一些创新型的国家中, 科技创新对 GDP 的贡献率高达 70% 以上, 而美国和德国甚至高达 80%。截止 2017 年, 中国的科技创新对 GDP 的贡献率却只有 40% 左右。而且, 我国缺乏关键技术。以手机为例, 有人形象地说, 我国的手机无脸、无脑、无心, 即人脸识别、后台运营和核心芯片都不能自主生产。美国对中兴通讯的打击, 就是极其现实的事例。

自 18 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 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 没有强大的制造业, 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核心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 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在激光、微晶钢、通讯、航天、高铁等制造方面, 目前处于世界超一流水平, 而在其他的重工、轻工、电子原件等方面还相对较弱。《中国制造 2025》明确指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个重点高端制造领域。这表明, 我国已经意识到发展高端制造业的意义。但美国对此颇多顾虑, 并成为中美贸易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化解中美之间的分歧, 如何有效地落实这一规划, 还需要探讨, 妥善把控。

近几年来, 我国在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但防备金融风险, 不意味着釜底抽薪, 遏制金融产业的发展。正好相反, 金融业是我国当前的一个短板, 需要尽快弥补, 并创新发展。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挥舞贸易战和经济制裁的大棒, 主要是其实力和影响力, 其核心内容是成熟市场、创新能力、科学技术和美元金融。金融业对美国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美元为例, 全球几乎 90% 的货币交易, 都涉及美元, 或者以美元的形式来进行, 这意味着全球每天都有价值 4.4 万亿美元的交易。此外, 全球各大央行大约 60% 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元, 总计 6.5 万亿美元。美国也是全球金融体系最为发达、最具创新的国家。

虽然有人把金融产业划归虚拟经济, 但是, 我们要赶超美国, 离开了金融实力完全是痴人说梦。我们必须补足金融方面的短板, 包括股市、债市和汇市诸多方面, 尤其是要促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业发展, 同时, 自身也发展

成一个强大的产业。

在当前情况下, 我国要在 3 个领域把长期占用的资本解放出来, 让其流入最需要的地方和我国战略布局的领域:

一是房地产。居民购房的资金无非是自有资金和贷款与借款。2007 年, 我国居民债务占可支配收入低于 35%, 而最新数据显示, 已经高达 90%, 差不多已经快追上美国次贷危机前的水平了。这部分资金大多被套牢在房产上。因为房价持续上涨, 还出现了一个“炒房”阶层, 即购买住房不是用于居住, 而是用于投资, 实则是投机房价持续上涨。无论是自有资金, 还是银行贷款, 还是炒房资金, 把本应该用于正常投资的资金转移到了房地产, 会造成实体经济运营与发展资金的不足。

二是股市。2018 年已弹指过去了一半。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 今年美股纳斯达克指数涨幅达 7.85%, 其最近的三年涨幅为 46.54%。相比之下, 今年上半年, 我国上证指数下跌 15.73%, 深成指下跌 17.83%, 分别位居 16 个全球市场指数的第 15 名和第 16 名。而且, 过去三年的涨幅也双双垫底, 从 2015 年 6 月 28 日以来, 分别下跌了 33.53% 和 37%。我国股市套牢了绝大部分股民的资金, 这样, 一是造成了民间资本投资实体企业的资金不足; 二是股市长期低迷, 也造成了上市企业再融资的困难。

三是国企占用资金。我国银行从资金安全的角度出发, 更愿意把资金贷给国有企业, 而非民营企业。但相对于民营企业, 国企资金占有量大, 使用效率低。不少国企甚至成立小额贷款公司, 按 7%—9% 成本从银行贷款, 再转手以 18%—24% 的高利率贷给中小企业。这不仅仅进一步加剧了银行信贷资金的紧张程度, 还大幅度地推高了市场利率。还有补贴问题。通过上市公司数据估算, 2017 年, 我国政府向企业发放的补贴规模在数千亿级别, 按照中性假设的估计值, 同年企业所获补贴的金额超过 4300 亿元。然而, 政府补贴的分配向国有企业倾斜, 使得民营企业在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加剧了融资的压力。

总之, 吸取委内瑞拉和土耳其危机的教训, 我们要综合施策, 长短结合, 防患于未然。短期内, 要减少货币的超发, 控制通货膨胀, 防范债台高筑, 尤其是控制与减少地方债务, 防止和化解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从长远战略角度看, 一定要通过强化上述“三高”产业, 打造国家核心竞争力。这不仅可以化解中美贸易战, 防范委内瑞拉和土耳其类似的危机, 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根本之策。